

中國改革開放推動經濟增長的展望

周天勇 田博

2022年中國共產黨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總的戰略安排是分兩步走：從2020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把國家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①。我們測算，要達成這一目標，2035年前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需要保持在5%至6%區間，至少不能低於5%。但基於經濟學界經典索洛增長模型(Solow growth model)的預測，中國經濟可能陷入2%左右的低速增長區間。一些學者提議需要將3%左右的代表廣義技術進步的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年均增長作為未來現代化發展的動力。但是，能不能實現這一願望，也存在着不確定性和風險^②。

二十大報告強調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提出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完善產權保護；特別在推進二元體制轉軌方面提出一些新的內容，比如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保障進城落戶農民合法土地權益，鼓勵依法自願有償轉讓^③。

本文的看法是，中國1978年以來的高經濟增長的奇迹來源於改革開放，二十大後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仍然有年均增長5.5%的潛力。但主要基於中國是一個體制漸進轉軌國家，維持着一個特長周期的二元體制並存的經濟體制，需要推進改革開放來釋放因體制扭曲而被禁錮的生產能力和財富價值。本文首先對改革與經濟增長的定性邏輯和數理邏輯進行分析討論，從階段邏輯、先後順序邏輯和漸進邏輯等方面，闡述改革與經濟增長的定性關係；在數理邏輯方面，我們認為，扭曲作為二元體制的常態現象，市場競爭或者政府沒有干預狀況下的標準值與二元體制扭曲值之間，存在着體制扭曲差值。一方面，體制扭曲差值與資源總量的乘積對應着閒置浪費資源及損失；另一方面，體制扭曲導致的資源、要素和財富價值損失，如果通過體制改革加以釋放，

則可以視為能釋放於經濟增長的生產、消費和資源的未來增長潛能，本文由此構建以體制扭曲差值為核心變數的數理邏輯關係框架。第一節考慮二元體制特殊性。第二節對二元體制經濟低速增長進行定義與討論，將二元體制轉軌國家TFP分解為廣義技術進步和經濟體制改革兩部分。第三節基於經濟增長潛能方程，設想在市場化體制改革和更大力度的開放得以落實的情況下，仿真(simulate)未來的增長和發展前景。

一 二元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的定性邏輯和數理邏輯

中國與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體制瞬時轉軌國家和結構轉型發展中國家不同，具有二元體制特長周期漸進轉軌的不規則特徵。因此，一般適應於市場經濟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分析的索洛(Robert M. Solow)、劉易斯(William A. Lewis)和喬根森(Dale W. Jorgenson)模型，包括運行體制是市場經濟但政府加大投資干預的哈羅德—多瑪模型(Harrod-Domar growth model)等，在核算、解釋中國經濟高增長歷史和仿真、推演未來經濟增長速度方面，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不適應性。

自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學界的一個缺憾是，沒有建立起轉軌時期二元經濟體制下經濟增長的數理分析方法。一是找不到一種方法，無法從數量計算的角度大體貼切地解釋中國過去國內生產總值(GDP)高增長的源泉；二是在改革開放發展的十字路口，無法從數理分析的邏輯去仿真、推演未來需要的體制改革，也無法針對性安排基於經濟增長潛能測算的改革方案。一個難點是，如何在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之間建立起有內生變數的數理邏輯關係。

(一) 特長周期二元體制轉軌

前蘇聯、東歐和蒙古等國家，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軌，時間大體在三年左右。對此，經濟學界關注的是短期的經濟轉變，發現這些國家主要是採用緊縮需求、折算債務、放開市場和盤活資產等方式，使瞬時的一元計劃經濟向一元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得以實現。這一轉軌形式既沒有總結動態增長學理所需的長周期時間，也沒有建立刻畫其狀態之模型的必要。而中國採取了漸進改革的路線，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已經四十四年，至今還沒有結束，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二元並存，這就是中國經濟體的特徵。

作為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國家，中國有着自己的特點。從學理講，其歷史邏輯與改革的階段、先後順序邏輯，大體上是一致的。

從改革的階段邏輯看，中國經濟體制轉軌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調節的釋放時期(1978-2000)。主要內容包括：

實行價格和供銷雙軌制改革，承認物質利益，建立市場主體；一部分供銷市場化，藉此培育價格機制。第二個階段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共存的膠着時期（2001-2021）。一方面，從放開供銷市場向資源配置市場化推進，產品和生產要素配合市場化供求，價格機制在國民經濟中發揮愈來愈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人口生育計劃管理、城鄉人口遷移戶籍分割、土地和農村住宅禁止交易、建設用地進行計劃指標分配、資本配置上國有企業（國企）和民營企業（民企）差異對待的所有制歧視等計劃和行政管理體制。

具體來講，在1978年至今向市場經濟調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並存兩個階段中，有三個重點改革：一是承認和落實個人和企業的經濟利益，糾正平均主義，廢除勞動者幹多幹少獲取一樣的工資工分的制度，以及企業不論盈虧都劃撥資源的配置和供給體制；個人多勞多得，除了勞動力之外，資金、房屋和技術等要素投入也按照企業對產出的貢獻和參與進行分配。二是創造營商的法律和其他條件，培育、引進和發展追求經濟利益的市場主體，接受市場競爭；1978年後允許個體經營戶存在，1992年後承認個體戶、民企和外資企業（外企）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國企和集體企業進行股份和公司制改革。三是逐步形成市場體系，先是落實初等雙軌制，農村、鄉鎮企業和國企超產的部分商品，可以到計劃經濟外的市場上銷售，可以在計劃定價之外隨行就市確定價格，繼而全面放開銷售和價格，由市場供求和定價。要素配置方面，通過資金由國家撥款改為銀行貸款，透過銀行間接融資改為在股市、債市直接融資等措施，建立了資本要素市場體系；通過勞資雙向選擇、資方合同聘用、勞動者進出自由、社會保險（社保）制度建立等措施，形成了勞動力要素市場。

最後一個階段應當是二元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並存體制轉向社會主義一元市場經濟體制並軌的時期。主要是繼續改革與人口流動和勞動力配置相關的戶籍管制等體制，繼續改革銀行貸款；股市、債市融資方面制訂針對所有制歧視的一些規則，修正在投資專案市場准入、行政司法訴訟、土地資源配置和政府公共服務等領域的所有制偏好和歧視，防止一些行政管理部門推進以政府管制為主的理念和擴大在各領域過度干預市場競爭和市場機制運行的傾向；改變農村土地房屋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並置、資源（無價格）與資產（有價格）並存的狀況，形成城鄉統一的土地要素市場與土地房屋產權和資產制度；在土地交易利益的分配體制上，需要尊重農村城郊農民集體土地的所有制與城鎮工業交通水利等國有土地不同，土地和收益二者之間的交換應當等價，在土地交易中給予農民更多的利益，進而改革地方政府依賴土地出讓和城鎮開發商交納房地產稅為主要收入來源的體制。最後的二元體制並軌改革，實際是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最為艱難的攻堅階段。

從改革的先後順序邏輯看，在內容上有先後之分，有的改革已經完成，有的基本完成但需要進一步完善，有的改革還在進行中，也有改革剛剛開始或者還沒有正式啟動。

首先，產品市場化改革最先開始。主要內容包括：承認個人和企業利益差別，勞動者以勞動強度和工作品質進行收入分配；培育和接納更多個體戶、民企及外企等市場主體，其產品和服務通過市場供需和價格調節獲得差異化收入；擴大產品市場化供銷的範圍、數量和比例。

其次，逐步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資產配置方面，資金從國家撥款過渡為銀行貸款，允許民間借貸，批准金融機構借貸、企業發行債券，建立證券交易機構，發展保付代理（保理）、保險、期貨、信託和擔保等機構及業務，形成基本的資本要素市場體系。勞動力配置方面，允許和放開農民進城務工；勞動者務工和企事業單位用工雙向選擇，企業和社會用工工資由勞動力市場供求決定；普遍推行勞動合同制，進行國企職工下崗分流和再就業改革，發展勞務中介機構，由此基本形成勞動力要素市場體系。土地要素配置方面，目前建設用地仍是通過計劃指標分配，從農民集體獲得土地的方式為行政補償式徵收，只是在出讓土地使用權上建立了地方行政壟斷的拍賣市場，嚴禁農村的非農業土地建設和農業土地使用權交易，還未形成城鄉統一的土地要素配置市場。

最後，城鎮居民住宅以外大幅度的土地資產化改革還沒有開始。1990年代隨着外企進入及個體戶、民企興起，產生大量土地和住宅需求，工商業和住宅用地可以實行有償交易，進行會計核算後成為企業資產。國家於1998年推動城鎮住宅商品化改革，現有住宅出售給居民職工後成為家庭資產，新增的住宅需求可以通過一級市場的房地產商開發建設及銷售、二級市場的二手房市場交易加以滿足。因此，城鎮住宅成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資產。農村的



隨着外企進入及個體戶、民企興起，產生大量土地和住宅需求。（圖片由肖競提供）

耕地、園地、林地、宅基地及其他建設用地和房屋雖然是生產和生活性資源，但不允許進行市場化交易，亦無法定價，並不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資產。

在二元體制並存的情況下，中國的漸進改革邏輯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產品價格和資產配置的雙軌制。二十世紀70年代末改革啟動時，在資源和產品配置方面，國企的一部分投入品和產出品仍由計劃經濟調節供應數量，價格由行政手段確定；另一部分計劃外生產的產品，以及鄉鎮企業和農村自主生產的產品則放開管制，由市場交易進行配置，價格通過市場供求關係確定。

二是先有改革的創造性典型或者改革試點，再總結經驗、制訂頂層方案，最後進行普遍性推進。比如，1978年11月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十八戶村民選擇了開啟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道路，結果是農業增產、上繳增多、農民增收。中央總結其經驗並制訂和完善方案，最後在全國實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廢除了人民公社。再如，1979年1月湖北省老河口市十五戶地方國企率先進行利潤從上繳向繳稅轉軌的試點改革，隨後全國部分地區和數百戶國企相繼列為試點進一步擴大推進，中央政府權衡利弊後形成最終方案，於1983年7月在國企普遍實施了利改稅改革。

三是區別增量和存量，進行差異化改革。比如，在勞動力要素配置體制上，新晉職工按照新體制，原有中老年職工保留傳統方式。以時間換改革，在老職工退休後逐步縮小舊體制的存量規模。

(二) 改革與經濟增長內在的數理邏輯關係

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主要來自於對國內外發展橫向比較後對雙方差距的認識，以及為國內經濟社會困境所迫。中國在推動改革時選取了「摸着石頭過河」、大膽設想、先試後擴、逐步推進的模式。對於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國內外學者進行了較多的研究。有的定性分析和論述無法進行數量計算；有的用改革開放前後經濟增長數據來比較分析，但無法揭示改革與增長的內生關係。而用一般市場經濟、經濟發展和凱恩斯主義 (Keynesianism) 等增長模型分析中國經濟的研究，其內容與後面體制改革建議之間大都沒有相互針對性的邏輯關係。原因在於，改革並沒有成為一個內生變量，被包含在分析模型之中。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產出和增長模型，雖然包含強調市場調節的新古典主義、注重國家需求的干預主義和偏重經濟發展的結構主義等不同理論，但其暗含最基本的假定為：分析的對象是競爭性市場體制下的經濟體。而在二元體制轉軌中，配置機制扭曲是國民經濟中的常態現象，我們認為，研究二元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關係的出發點應為體制扭曲^④。

首先，體制扭曲具有可糾正性和不可糾正性之分。一方面，部分體制扭曲被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市場行為所糾正。在改革的過程中，一些勞動力要素、資本要素和土地要素還沒有市場化，但農民自己承包土地上的農產品、

鄉鎮企業利用農村土地建廠生產加工產品、國企生產一部分計劃外產品；在價格和供銷雙軌制的體制安排中，它們均可以在農貿市場和計劃經濟外的其他渠道銷售。在這種情況下，追求經濟利益的勞動者和企業主體通過產品市場化銷售，糾正了生產要素不能進行市場化配置的扭曲，活化勞動力、資本和土地要素帶來的工資、利潤和地租，避免了生產損失。另一方面，部分體制扭曲無法通過市場行為糾正。勞動力要素配置方面，戶籍管制所附加的子女教育、居住成本、醫養、社保和土地黏性等；資本要素配置方面，對民企的信貸歧視和國企資本使用的低效率；土地要素配置方面，禁止農村土地交易、不向農民分配用地指標和拆除違建等，這些扭曲根本就無法變通，或者變通的成本和風險大於變通的收益，均無法由市場主體追求經濟利益的行為所糾正。

其次，體制扭曲差值是內生於改革與增長數理關係的核心變數，其數理邏輯表達公式為國內市場競爭領域或其他市場經濟國家標準值與二元體制扭曲值相減的差值，即「 z (差值) = y (標準值) - x (扭曲值)」。這種扭曲是二元體制經濟運行低效率的重要成因，也是可通過改革提高效率的源泉所在。藉以上公式或可尋找各個方面的差值：例如生產方面，邁入同等發展水平和階段的國家之農業勞動力就業標準值與中國的相關扭曲值、轉軌國家的宏觀稅負率標準值與中國的相關扭曲值、民企資本權益的淨利潤率和債務資本的貸款利率標準值與國企的相關扭曲值、競爭性市場經濟國家土地要素市場配置的標準狀況與中國在禁止農村土地交易下市場配置的扭曲狀況。又如土地房屋財富價值和土地交易利益分配方面，城市可轉移土地、土地可交易及定價的資產性狀況與農村剩餘土地禁止交易的非資產性狀況，地方政府在市場上高價格出讓土地的資產性標準狀況與農民集體向地方政府轉移土地時只獲得接近零價格的行政補償的資源性扭曲狀況，城鎮居民可交易住宅的資產性標準狀況與農村居民房屋禁止交易的零價格資源性扭曲狀況。

再次，可通過體制扭曲差值計算體制扭曲造成的資源、要素和財富價值損失。從生產側數理邏輯看，各種閒置浪費的生產要素總量，等於資源總量乘以體制扭曲差值，算式表述為「 Los (損失) = Res (資源) $\times z$ 」。我們據此可以計算出由體制扭曲造成各種被利用要素的產出損失值。比如，2021年，國企總資產為311.46萬億元(人民幣，下同)，總的淨利潤為32,970億元，總資產淨利潤率為1.06%，而民企總資產淨利潤率最低也達到5.5%，則資本要素配置扭曲導致的國企資產淨利潤損失是「311.46萬億元 \times (5.5% - 1.06%) = 13.83萬億元」。此外，產出損失除以市場經濟標準值，則可以求出各方面閒置和低利用的資源，即體制性剩餘，公式為「 Su (體制性剩餘) = Los/y 」。比如，「13.83萬億元 (國企資產淨利潤損失) \div 0.055 = 251.43萬億元 (體制性剩餘資本)」。

最後，體制扭曲導致的資源、要素和財富價值損失，如果通過體制改革加以釋放，則可以視為能釋放於經濟增長的生產、消費和資源的未來增長潛能。我們稱之為體制性剩餘。遺憾的是，國內外仿真、測算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型，基本都沒有考慮其潛能來自於哪裏。因為模型的假定要麼是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系，不存在體制扭曲，要麼是發展中國家農村農業人口和勞動力向工業城市

源源不斷地轉移的過程，並沒有受到體制扭曲的阻礙。而體制扭曲在中國這樣一個特長周期的二元經濟體制中比比皆是，是一個常態化的事實。我們需要通過改革釋放被體制扭曲所禁錮的潛能。其數理邏輯是經濟增長的潛能，等於體制性剩餘乘以不同年度改革強度，除以市場競爭標準值。參見以下公式：

$$\frac{\Delta G_k}{G} = b \times \frac{K_s \times (y_k - x_k) \times m_i / y_k}{K}$$

G 即GDP； ΔG_k 即體制性剩餘資本盤活利用的GDP增長潛能； b 即資本要素投入產出系數； K_s 即國有非金融企業總資本； K 即全社會非金融經營性總資本； y_k 、 x_k 分別指資本利用市場經濟標準值與二元體制扭曲值； m_i 即體制改革強度， $\sum m_i = 1, i = 1, 2, 3 \dots$ 。比如據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以下簡稱「實驗室」）計算，全社會非金融經營性總資本為848萬億元，國企體制性剩餘資本比率為29.60%，假定未來十五年中資本產出系數為25%，社會總資本年均增長4%，通過國企和金融體制改革，盤活體制性剩餘資本發揮應有的產出作用，則會獲得年均0.36%的新增長潛能。

因此，找出市場經濟標準值 y 和二元體制扭曲值 x ，並用其差值 z 計算資源、要素和財富價值損失，將損失視作體制性剩餘，以「體制性剩餘 × 改革強度」，即將 $y-x$ 引入經濟增長的生產或需求函數，便可以內生地核算或者推演二元體制經濟體的經濟增長。

二 改革推動經濟增長的兩大來源

從生產側看，中國經濟學界需要做三方面的工作：一是計算1978年以來中國TFP增長的數據，並與國際進行比較，以便將TFP增長分解為廣義技術進步和經濟體制改革兩部分來源；根據學者和機構研究，判定廣義技術進步TFP增長規律。二是計算體制不變及其扭曲值不向標準值靠近的情況下的自然經濟增長。三是由於體制性剩餘土地的存在，需要將新古典主義探討經濟要素投入時採用的勞動與資本對數函數，調整為勞動力、資本和土地三結構的古典增長模型。

（一）經濟體制改革及廣義技術進步TFP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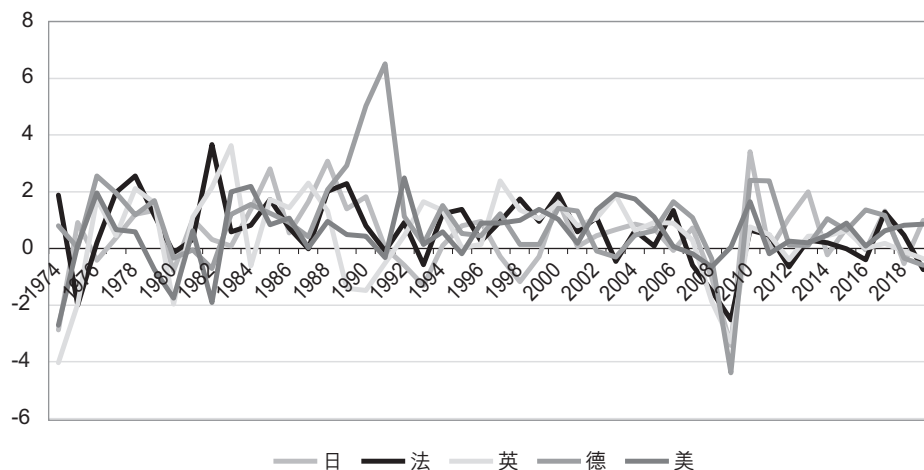
在二元體制國家經濟增長潛能的來源和動力方面，相關研究存在着兩個誤區：一是認為TFP都來源於教育普及、知識增長、人力資本積累、技術產業化等廣義技術進步；二是認為廣義技術進步（即創新）可以推動GDP增長率趨勢向上。

市場經濟體制下，TFP主要來自於教育普及深化、科學知識增長、人力資本積累和新技术產業應用；但在長周期二元體制轉軌國家，TFP有一部分出自市場化改革形成，主要來源於資源和要素市場化配置使生產率提高，以及土地房屋資產化（從零價格到市場價）的溢值。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TFP增長率遠高於市場經濟發達國家。1978至2021年，據實驗室計算，中國TFP年均增長3.32%，增長幅度遠高於日本、法國、英國、德國、美國。從國內外一些學者和研究機構的數據看，中國TFP年均增長率大致位於3%以上的水平。如周紹森和胡德龍的數據顯示，1980至2007年，中國TFP年均增長4.59%，對同期GDP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45.62%^⑥；亞洲生產力組織(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APO)的數據顯示，1978至2018年，中國TFP年均增長3.67%，對同期GDP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38.59%^⑦；孫琳琳和任若恩的數據顯示，1981至2005年，中國TFP年均增長3.15%，對同期GDP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32.18%^⑧。這並不意味中國的創新能力要比各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強，而是1978年以來在中國的TFP中，除了廣義技術進步TFP，還有很大比例的經濟體制改革TFP，其內容為生產力提高、市場化改革和城鎮住宅資產溢值。

從全球主要市場經濟國家長周期的歷史看，在大規模物質生產的工業化中後期和後工業化階段，廣義技術進步TFP增長是一條速度在0.5%至1%之間平緩發展並略微下行的曲線。觀察歷史數據，這些國家的TFP增長趨勢是一條波動幅度不大且平緩的曲線。從荷蘭羅格根大學團隊計算結果來看，1974至2019年，日、法、英、德、美的TFP年均增長率分別為0.59%、0.51%、0.72%、0.58%和1.04%（圖1）。

圖1 日、法、英、德、美 TFP 年均增長率 (%)，1974 至 201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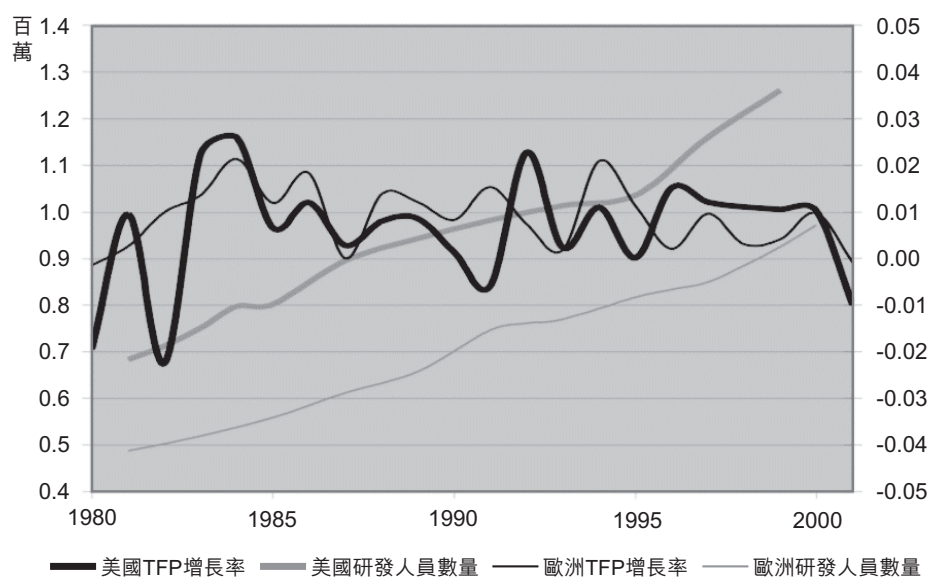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10.0”，www.rug.nl/ggdc/productivity/pwt。

據APO的研究數據顯示，1978至2018年，美國、日本和韓國TFP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0.90%、0.79%和1.04%。瓊斯(Charles I. Jones)在〈內生增長模型的時間序列測試〉(“Time Series Tests of Endogenous Growth Models”)一文中質疑創新能夠加速經濟增長的觀點，因為在1960至1988年間歐美研發人員投入的增加並沒有使當地TFP增長幅度提高，二十九年間研發人員向上向右的研發投入增長曲線並沒有推動TFP也形成向上向右的增長曲線^⑨。

維斯帕根 (Bart Verspagen) 透過製作圖表來展示 1980 至 2000 年研發人員數量和歐美 TFP 的增長趨勢，歐洲和美國 TFP 年均增長率分別為 1% 和 0.9%，並認為 TFP 的增長是波動幅度較小和長期平緩變動的曲線，以回應瓊斯的觀點 (圖 2)。圖 1 所示符合二人的分析，從日本、美國和歐洲四十六年 TFP 增長趨勢看，其幾乎與橫軸平行，甚至略微下降。

圖 2 歐美研發人員增長與 TFP 增長對比，1980 至 2000 年



資料來源：Bart Verspagen,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novation*, ed. Jan Fagerberg et 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506.

1978 至 2017 年，中國 GDP 年均增長率為 9.51%，我們通過測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獲得的 TFP 年均增長率為 2.49%，也就是說經濟增長的 26.18% 是經濟體制改革 TFP 所貢獻^①。TFP 中的 77.01% 為推進大力度改革、釋放了禁錮在扭曲體制內潛能而形成。還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前的 1971 至 1977 年，APO 計算的中國 TFP 年均增長為 -2.04%。也就是說，在還沒開始改革開放之時，生產低效率和財富禁錮損失遠大於廣義技術進步帶來的增長，以致在投資高增長和就業勞動力增長較快的情況下，GDP 年均增長速度卻在 5% 以下。

(二) 二元體制不變下的經濟低速增長

現代經濟學教科書及大量文獻中，關於增長常涉及經濟自然增長率、經濟增長潛能等定義。自然增長率，也被視為潛在增長率，一般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各類生產要素得到最優配置和充分利用下，其經濟所能達到的最大增長率。當國民經濟中可以促進增長的資源、要素、需求和資產還沒有通過主觀措施加以利用時，經濟增長率通常低於潛在增長率，即國民經濟存在着增

長潛能。市場經濟體制中的潛能常受制於流動性不足等方面導致的經濟蕭條；而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並存的二元體制中，要素生產、收入消費和貨幣流動性等各方面的潛能被禁錮在體制扭曲之中，表現為體制性剩餘^⑩。體制扭曲造成投入產出的低效率、生產過剩和經濟蕭條，如同市場經濟國家一樣，表現為失業率上升、高投入和低產出，或者發展到工業化中後期增長明顯乏力，但其增長潛能則不同於市場經濟國家，在於體制性剩餘要素及資產，一般的擴展性財政和貨幣政策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深層次癥結。本文認為，在無針對性措施的情況下，二元經濟體制下的經濟增長率可能逐步趨於低速增長區間。

中國二元體制經濟體的未來增長潛能，源於通過改革糾正體制扭曲，推進體制扭曲值不斷地向市場標準值逼近，使體制性剩餘不斷地從被禁錮的體制中得到釋放。但是，如果轉軌停頓和體制不變，按照自然經濟增長趨勢，增長速度可能處於2%左右。對比中國改革前、改革至今及未來十五年的預測：1957到1977年（剔除1958年這一特殊年份數據），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率為45.42%，勞動力年均增長率2.62%，資本形成年均增長率10%，GDP年均增長率5%。1978到2021年，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率下降至15.95%，勞動力年均增長率下降至1.50%，資本形成年均增長率提高至15%；在投資和勞動力同步大幅降低的情況下，GDP年均增長率卻達到了9.24%。從未來十五年要素投入預測來看，就業勞動力將大概率按照年均增長率-1.10%的發展趨勢，資本年均增長率將位於3%至4%增長區間；根據發展經濟學規律，當經濟發展中出現產能過剩及勞動力市場轉折後，資本產出彈性一般會出現緩慢下降的趨勢，而勞動產出彈性會出現緩慢上升的趨勢^⑪。因此，假設資本產出系數從目前的0.6逐漸下降為0.4，而勞動產出系數從0.4逐漸提高到0.6，同時樂觀估計廣義技術進步TFP年均增長在0.8%的情形下，中國未來年均GDP增長率也僅為2%至2.5%左右。

三 經濟體制改革加快經濟增長的模擬推演

本文上述部分構建了以體制扭曲為出發點、扭曲差值作為核心變數的經濟損失、體制性剩餘及經濟潛能分析的邏輯框架。實驗室在這一創新性框架基礎上，對中國二元體制下的體制性剩餘及經濟增長潛能進行一系列情景模擬及數據測算。

（一）體制性剩餘測算

考慮各類數據的可得性，以2020年為基準，我們對二元經濟體制下各類扭曲差值及體制性剩餘進行測算：一是體制性剩餘生產要素。人口和勞動

力要素方面，考慮中國與類似發展水平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差值，以及標的人口14億1,178萬，預計農村存在體制性剩餘人口2億1,177萬人；考慮農業就業比率差值及全國總就業勞動力7億5,064萬人，預計農業領域中剩餘勞動力為1億9,121萬人；假如我們將外出務工工資水平作為標準值，將在農村從事第二、第三產業收入作為扭曲值，根據其差值也可以計算出目前在農村第二、第三產業中體制性剩餘勞動力數量。資本要素方面，考慮市場環境下民企5.5%的權益資產利潤率及國企1.62%資產利潤率，加上民企平均加權貸款利率8%，而國企約4.35%水平，經我們測算，體制性剩餘國有債務和權益資產規模達122.34萬億元。

二是體制性剩餘資產。我們將可交易、可定價和可抵押的土地房屋視為市場化標準資產，農村土地房屋、城鎮土地禁止市場交易的部分視為非資產性狀況。因此農村體制性剩餘資源可通過耕地、林地、宅基地及其他可交易建設用地規模，以及其影子價格進行測算。城鎮體制性剩餘土地，則反映在國企及其他使用者使用的工業、物流、倉儲等建設用地，通過其市場價格進行測算。預計體制性剩餘農村房屋及各類土地、城鎮可交易土地資產合計為786萬億元，剔除農村住宅資產中宅基地成本的重複計算，最終約為705萬億元。

(二) 二元體制生產側改革與增長潛能數理邏輯

將資源利用價格和要素利用比例的標準值和扭曲值作為內生變數，並且設置各年不同幅度的體制改革強度，則資源資產化與要素市場化配置等生產側改革所形成的新經濟增長潛能為：

$$\frac{\Delta G_{tp}}{G} = \frac{\Delta(L_v \times R_l \times p_l + H_v \times R_h \times p_h) \times I(\omega)}{A} + \left\{ a \times \frac{W \times (y_w - x_w) \times m_i / y_w}{W} + b \times \frac{K_s \times (y_k - x_k) \times m_i / y_k}{K} + c \times \frac{L \times (y_l - x_l) \times m_i / y_l}{L} \right\}$$

ΔG_{tp} 即生產側改革下新增GDP； L_v 即農村土地面積； R_l 即農村土地交易率； p_l 即農村土地價格； H_v 即農村房屋面積； R_h 即農村住宅交易率， p_h 即農村住宅交易價格； $I(\omega) = \begin{cases} 0, & \text{禁止交易} \\ 1, & \text{允許交易} \end{cases}$ ； W 即總就業勞動力； K_s 即國有非金融企業總資本； K 即全社會非金融經營性總資本； L 即可交易建設用地總面積； a 即勞動要素投入產出系數， b 即資本要素投入產出系數， c 即土地要素投入產出系數， $a+b+c=1$ ； y_w-x_w 、 y_k-x_k 和 y_l-x_l 分別指就業、資本和土地利用市場經濟標準值與二元體制扭曲值， m_i 即體制改革強度， $\sum m_i = 1, i=1, 2, 3 \dots$ 。

GDP總增長為前述的自然增長率加本節所述的改革開放所釋放的經濟增長潛能。

(三) 未來改革支撐增長速度的仿真、推演

體制性剩餘在扭曲糾正下進行釋放，帶來新經濟增長潛能。實驗室通過模擬不同改革及扭曲糾正情景，藉此測算在未來十五年推進生產側改革可以獲得的經濟增長。

首先，改革的重點是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其一，在勞動力要素領域放開戶籍制度，允許人口自由流動。經測算，2020年總就業勞動力為7億5,064萬人，農村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和城鎮國企事業、行政等單位中存在體制性剩餘勞動力1億9,500萬人，考慮自然退休和去世約5,850萬人後，通過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如相關扭曲體制徹底改革放開，將剩餘的1億3,650萬人測算到未來各年份，未來十五年勞動力年均增長率將達到1.3%左右。其二，推進資本要素市場化改革。如深化國企改革，提升國企權益和借貸資本效率，資本利潤率將由平均2%提升到6%左右，接近民企水平；另外，應完善銀行信貸及其他融資體制機制，消除對民企的信貸歧視。其三，推進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土地要素是計劃經濟體制最根深蒂固的領域，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的關鍵在於盤活被體制扭曲禁錮的各類城鄉土地資源，形成可交易、可定價的競爭性市場。通過上述情景模擬和測算，要素市場化改革將帶來年均1.5%左右的經濟增長率。

其次，推進城鄉土地和農村宅院資產化領域改革。前面已述，與城鎮住宅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資產不同，農村的耕地、園地、林地、宅基地及其他建設用地和房屋，仍不具備市場化資產的屬性，農民無法從中獲得資產化的財富。通過資產化改革，實現從原本無價格的資源到有價值資產的財富創造。2020年，中國存在可以資產化的農村住宅建築面積273億平方米，資產價值約95萬億元；農業領域方面，耕地19.2萬億畝、園地3.03萬億畝、林地27萬億畝、草原39.7萬億畝，資產價值合計約397萬億元；建設用地方面，分別存在鄉村建設用地3.3億畝、城市和縣城工業物流用地2.3億畝、非縣城建制鎮工業用地773萬畝及礦上用地3,664萬畝，資產價值約349萬億元。考慮不同資產的交易率及增值率，最終預測城鄉土地和農村宅院資產化改革帶來的年均經濟增長在1.19%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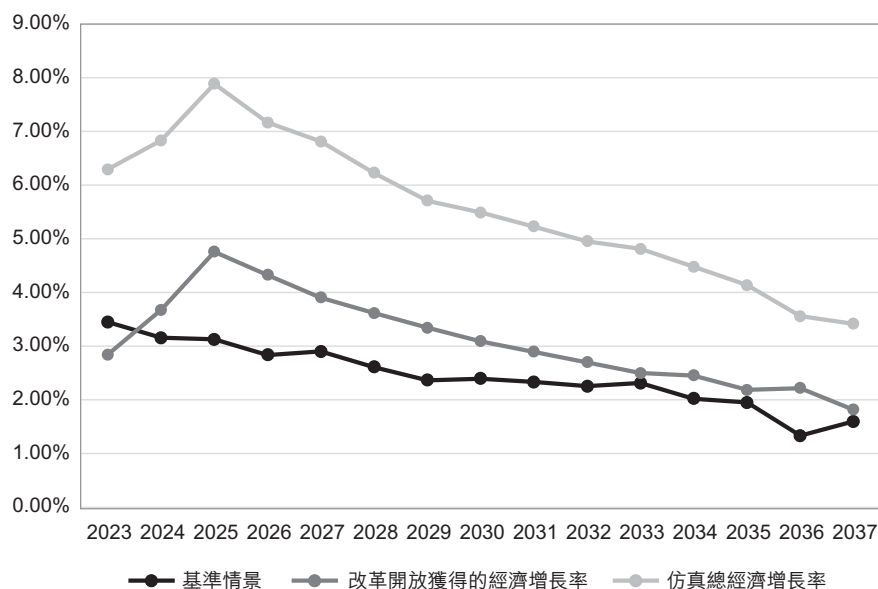
再次，通過調水改土增加土地要素。中國國土可利用土地率在全球處於中下游水平，仍是低水利發展水平國家。世界上大部分國土和人口大國也基本存在着水資源配置不均的問題，都實施了調水以便進行國土開發、擴大發展空間的戰略舉措^②。與加拿大、歐洲各國、印度、巴基斯坦和美國等調水強國相比，中國人均調水量在它們的1/25到1/5之間。中國如果在關內和東北地區分別建設南水北調網和北水南調網，總計調水量2,000億立方米，預計可增加7億畝土地，作為建設用地和農業用地。我們預測，通過實施調水改土重大發展戰略，將可帶來年均約0.3%經濟增長率。

另外，實驗室針對國家對外開放情景同步進行模擬測算，一是適當放開移民，每年引入250萬具備相似文化背景、較高人力資本及消費能力的人口，二是

擴大對外貿易交流，加大外企引入，提升出口競爭力。在加大對外開放政策下，生產側將帶來年均0.18%增長率，需求側對經濟拉動潛能年均1.5%左右。

綜上所述，我們從生產側對不同體制改革情形下的經濟潛能進行模擬測算，通過深化改革開放帶來年均3.2%左右的增長，加上無重大改革開放措施下年均2.5%左右的自然增長率水平，中國經濟未來十五年年均增長率將達到5.7%（圖3）。

圖3 經濟體制改革情景下經濟增長潛能測算，2023至2037年



資料來源：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計算數據。

四 小結

與東歐和前蘇聯國家一般在三年時間完成經濟體制瞬時轉軌不同，中國是一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軌四十四年，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長期並存的二元經濟體制國家。當然，國內改革也可能因總體方案不明、實施方案操作性欠佳、部門和地方執行力不夠和改革遇到各方面阻力，還可能因全球局勢動盪不安、國際關係複雜多變、周邊形勢緊張加劇等因素，使推進步伐緩慢，甚至進程停頓，造成體制改革無法完成任務和達不到目標。這種狀況出現的概率不大，但一旦發生，將導致中國二元經濟體制下經濟增長率陷入低速增長區間，引發就業困難、財政收支緊張、養老金缺口、債務危機等一系列風險。

二十大報告描繪了中國未來發展的藍圖，在基本經濟制度方面，提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深入推進改革創新及擴大開放，尤其是在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等二元體制轉軌

方面進行了具體刻畫。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經濟增長提出更加迫切的要求，強調「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提出謀劃新一輪深化改革，並對高水平對外開放提出更加明確的要求^⑬。改革開放仍是破解當下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來源。因此，必須深刻認識中國改革與經濟增長的邏輯關係，通過體制改革外推式的正向衝擊，帶來經濟倒V型中高速增长態勢，這可能是中國到2035年人均GDP翻一番、初步建成現代化國家的希望所在。

註釋

①③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5版。

② 周天勇：〈索洛模型在分析中國經濟問題時的困境和改進思路〉，《財經問題研究》，2019年第8期，頁13-23。由於篇幅所限，本文略去了需求側內含差值變數的中國改革與增長數理邏輯推導及其供求均衡增長仿真。實際上中國經濟增長問題，更重要在於總需求不足，特別是居民收入和消費需求的相對收縮。讀者可以閱讀筆者發表的其他相關學術論文。

④ 本文數據、公式和相關論述，如無特別說明，均出自周天勇：〈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增長潛能測算——基於體制扭曲差值內生的核算和仿真〉，《財經問題研究》，2023年第1期，頁13-26；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計算數據。

⑤ 周紹森、胡德龍：〈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研究〉，《中國軟科學》，2010年第2期，頁37。

⑥ 參見“Asian Economy and Productivity Map”，www.apo-tokyo.org/asian-economy-and-productivity-map。

⑦ 參見孫琳琳、任若恩：〈轉軌時期我國行業層面資本積累的研究——資本存量和資本流量的測算〉，《經濟學(季刊)》，2014年第13期，頁854。

⑧ Charles I. Jones, “Time Series Tests of Endogenous Growth Model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 no. 2 (1995): 517-19.

⑨ 周天勇：〈要素市場化效率與土地和住宅資產化溢值——對中國二元體制轉軌經濟增長奇跡的一種解釋〉，《財經問題研究》，2021年第7期，頁16。

⑩ 周天勇：〈體制剩餘：轉軌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範疇——體制性剩餘要素市場化改革及經濟增長的新潛能〉，《學術月刊》，2021年第4期，頁45-55。

⑪ 中國社會科學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課題組：〈未來15年中國經濟增長潛力與「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及指標研究〉，《中國工業經濟》，2020年第4期，頁12。

⑫ 周天勇、田博：〈新形勢下我國人口與糧食安全戰略思考〉，《中國經濟評論》，2021年第7期，頁36-40。

⑬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人民日報》，2022年12月17日，第1版。

周天勇 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

田博 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博士生